




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  
——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Western World*



上卷

◎ 张旭昆 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

## ——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Western World*



上 卷

◎ 张旭昆 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全 2  
册 / 张旭昆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8-14375-2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经济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2874 号

## 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

——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

张旭昆 编著

---

责任编辑 田 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82

字 数 156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375-2

定 价 198.00 元(上、下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 前 言

## 宽容、开放、多元

——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应有准则

### 一、为何需要了解经济思想的历史？

经济思想史就是介绍、研究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历史。

为何需要了解经济思想的历史？

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越完善，对其发展历史的了解就显得越不必要，思想史的课程就越无地位。从单纯学以致用目标出发，逻辑体系完善之学科，学生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就足以掌握其基本原理。只有逻辑体系欠完善的学科，似乎才有必要了解其思想史。但是，从发展一门学科的目标出发，即便是逻辑体系完善之学科，仅仅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也仍然不够。

尤其是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的发展不会改变自然法则，而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引起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制度的演化，从而引起许多社会法则的变化，导致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因此，根据先前社会现象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即便具有完善的逻辑体系，也往往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是一门会改变人们行为方式的学科，它与实际经济生活处于一种正反馈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原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和难以解决的新问题。19世纪德国的经济发展使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失灵，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马歇尔的理論难堪，70年代的滞胀让凯恩斯的理论蒙羞。

当主流经济学可以为当时的经济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为当时的经济政策提供有效论证时，了解经济思想史似乎没有多大必要。然而一旦主流经济学不能胜任时，了解经济思想史的必要性就突显出来。居安需要思危，从长远看，为了推进经济科学的发展，那些愿意献身于经济学的学子完全有必要了解

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因为在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在当时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但对于解释以后出现的经济现象颇有启示作用的思想“基因”。整个经济思想史就是一个经济思想的“基因库”,作为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有许多暂时不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所接纳的理论观点。但是它们在社会面临新问题的時候,往往能够给人以启迪,帮助经济学家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面对人类社会不确定的未来,许多曾经非常有效的主流观点会由于新现象的出现而失去解释能力,而以往被人们认作是无用的甚至错误的异端思想却反而会发挥效力。所以,了解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哪些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学家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时发挥创造性、推出新的思想产品,具有重要意义。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在17世纪的洛克和19世纪的马尔萨斯、萨伊等人那里就已经萌生,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也早在17世纪的曼德维尔、19世纪的马尔萨斯和20世纪初的桑巴特那儿草创。马歇尔和凯恩斯对于经济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他们在熟谙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结果。

同时,了解经济思想的历史,有助于了解思想产品的生产规律,了解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特征,了解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学术环境下,才能够有效地生产思想产品,了解政府何种政策才能有效促进思想产品的生产。从16世纪以来,为什么经济思想主要起源并繁荣于欧洲,尤其是英国?而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思想未必比欧洲落后多少。汉代产生的《管子》一书,其包含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说是领先于欧洲同时代的经济思想,起码不会落后。19世纪是经济思想在欧洲大发展的年代,英国与法德两国相比,明显占有优势,是什么样的学术环境造成英国经济学大家人才辈出,而法德两国相形见绌呢?诸如此类现象仍然可以列举许多。为了促进经济科学的发展兴旺,难道不应该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中考察最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制度和学术环境么?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使世界经济难以复苏的欧洲主权债务病症,似乎再次表明,经济学永远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通用原理,永远需要通过重温历史寻求新的知识。

## 二、应当如何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

经济思想史属于广义思想史的一部分,其研究对象是各种历史文本尤其是经济学历史典籍所包含的经济思想。研究这些文本典籍,就是要搞清它们“所言何物、所言为何、所言为谁、所言对否、所言要否”。首先是要搞清它们“所言何物”,这是其他研究的基础。

所言何物,就是要搞清楚这些文本究竟包含有哪些经济思想。这些文本及其所包含的经济思想,对于研究者来说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象。它们构成

一种按时间排序的“客观的”经济思想史。但是研究者不可能对其单纯按时间先后进行录记,而是必须从这些文本中提炼出研究者所认可的文本作者的经济思想精华。这个“提炼”过程意味着经济思想史不可能是对于经济思想历史的纯客观描述,因为什么是思想精华,有着大量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这种经过提炼的经济思想史可以称之为“主观的”经济思想史。

承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法完全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随意“打扮”经济思想史这个“姑娘”,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对于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的具体内容,每个研究者都可以有自己一定的独特看法,这就产生了从形式到内容都各有千秋的“主观的”经济思想史。

本书作者认为以下规则是重要的。当然这些规则未必得到每个研究者的认同。

应当尽可能全面、如实地介绍文本作者的经济思想精华。

所谓精华,起码的一点是不能简单重复文本作者的前人已经提出过的经济思想,必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不应该只是对于前人已经表达过的思想观点,通过同义词置换来重新表达;即不能是文字表达上的创新,而是必须要有思想观点上的创新。它可以是与前人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观点,也可以是对前人观点的补充、深化、引申、发挥,还可以涉及前人未曾讨论的问题或论域。

全面介绍文本作者的思想精华,就是不要刻意遗漏。比如作者有 A、B、C 三方面的思想精华,就不应该只介绍 A 而遗漏 B、C。当然,不同时代的研究者,或者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研究者,对于什么是文本作者的思想精华,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有 A、B、C 三方面,有的可能认为只有 A。这种分歧往往起因于研究者把思想观点的重要性、正误性与创新性混淆了,往往不承认一些他认为不重要、不正确的观点是精华。本书坚持以创新性为标准来判断文本作者思想观点是否精华,即便这种观点似乎不重要、或许也不正确。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曾经不重要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后来变得重要又正确的现象并不罕见。而曾经被普遍认为重要且正确的思想观点后来变得无足轻重的现象也同样不罕见。

当然,如果需要专门研究某一个方面的经济思想史,即下面所说的专题史,那么对于文本作者的思想精华按需选取,也未必不行。比如专门研究 A 专题的经济思想史,那么不介绍文本作者 B、C 两方面的思想精华也是可以的。

如实介绍,就是不能走样,要基本符合文本作者的原意,尽最大努力避免误读误解。当然,要做到没有一丝一毫走样也是困难的,但力求减少走样是应该的。这就好像是把文本作者的思想精华 A、B、C 介绍成 a、b、c,但是不能介绍成 x、y、z。同时,最好也不要借题发挥,对文本作者的思想随意引申发挥,把 A、B、

C介绍成A<sup>+</sup>、B<sup>+</sup>、C<sup>+</sup>；更不能借壳“上市”，把文本作者原本没有的想法强加于他，借介绍文本作者思想之机兜售研究者自己的思想观点。思想史的研究不能为尊者讳，隐瞒自己所尊重喜欢的文本作者的不足和错误；也不能为恶者扬，夸大自己所厌恶不屑的文本作者的不足和错误，回避其正确的观点。

如实介绍，还必须如实反映文本作者关注的重点，即便这个重点对于以后的时代已经不再重要。例如，在介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就必须指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致富的对策是斯密关注的重点，而并非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在介绍李嘉图时则必须指出价值论分配论是他关注的重点，虽然他这两方面理论的学术价值在今天已经远远不如他关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

如何把握文本作者的原意、真实想法？如何全面如实介绍文本作者的经济思想？即如何理解文本及其作者？这是一个关于理解的方法论问题。由此将引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理解”是什么或什么是“理解”？这是一个关于“理解”的本体论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需要以解释学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

然而，全面如实介绍文本作者的原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文本作者的原意可能并没有在文本中得到准确表达，言不达意是常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普通学者身上，就是高手大家也往往在所难免。熊彼特就曾哀叹：“我觉得，我实际上想说的东西将永远说不出来。”<sup>①</sup>

其次，一个文本作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同文本中表达的经济思想是会变化的，或者是所关注问题的变化，或者是对同一个问题观点的变化。例如亚当·斯密起初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写下了《道德情操论》；后来关心国富民强，写下了《国富论》；两本书对于人性就有了不同的提法。于是对于斯密究竟如何看待人性，后来的学者之间就有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第三，有的文本只是文本作者未定的文稿，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文本作者最终的想法，后人难以确定的。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谁能说如果马克思再多活几年不会进行修改呢？

第四，文本所用词汇的含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一个语词的基本意义有时随着时间而改变，以致作品原来固有的意义将会失掉，而一种非固有的意义在阅读的过程中取代了它。”<sup>②</sup>这往往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不小的麻烦。例如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其内容其实是社会经济统计与预测，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配第生活的年代，“政治”一词的含义远比今天要丰富得多，

① 转引自[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熊彼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② [德]弗里德利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几乎就是今天“社会”一词的含义。了解了“政治”一词在过去的含义，就可以理解葛德文为何把他那本探讨社会正义的书取名为《政治正义论》。

第五，文本经过翻译，其原意就更加难以把握了。因为两种语言的词汇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五方面的原因，厘清文本作者的原意，搞清他言之何物，就成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一件艰难然而又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只有把每个文本所言何物搞清了，才能看清楚各个文本有什么区别，才能看清楚整个经济思想是如何发展演化的。

搞清楚文本作者言之何物，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其他方面的研究，都依赖于此。

所言为何，就是要研究文本作者为什么会提出和持有此种经济思想。这就需要研究者不仅要了解文本，更要知晓文本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文本作者的师承关系、人际网络、知识结构和宗教信仰，等等。

文本作者之所以具有某种经济思想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任何简单化地把它归咎于某个单一因素的做法都是会出错的。尤其是曾经广泛存在的把某个文本作者的经济思想与其社会地位阶级属性相关联的所谓阶级分析法，往往会闹出笑话。例如李嘉图按其社会地位，应当是属于拥有大量地产的地主阶级，而马尔萨斯则是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穷知识分子，然而两人的思想观点恰好相反，李嘉图主张废除谷物法，这将损害地主利益；而马尔萨斯则为地主收取地租作辩护。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经济思想的发展往往与其邻近学科有关。经济学的邻近学科有两类：一类是研究对象的邻近：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另一类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帮助：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社会调查与实验，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帮助的学科发展，会较快影响经济学。研究对象邻近的学科发展，往往对同时代的经济学影响有限；<sup>①</sup>但很可能对后一时代的经济学有影响，即有滞后影响。但滞后期多久？影响什么？有待进一步研究。

只有把每个文本所言为何搞清了，才能看清楚整个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

所言为谁，就是要研究文本作者的经济思想主观上是想为什么人服务，而客观上又会有益于谁。所言为谁与所言为何有区别，所言为何是探究经济思想的来源，所言为谁探究经济思想的目的和效果。文本作者有的会明确宣布其

<sup>①</sup>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四编第三章。



目的,而有的则秘而不宣;并且目的和客观效果也往往并不一致。这就需要研究者仔细探究,切忌简单地贴标签。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为谁服务?过去说他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实在是太牵强了。从《国富论》可知,斯密对那个阶级绝无好感,他怎么可能为了那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从《国富论》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客观效果来看,斯密是为所有消费者服务的。

所言对否,就是要研究文本作者的经济思想作出正确与否的评价。这种评价需要区分文本作者对于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对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对策以及他所采用的分析技术或分析工具。熊彼特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经济理论和经济对策正确与否,判定标准只能是长时期的实践,而不能是任何某个权威的观点意见。因为文本作者的观点与某个权威不一样,就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种判断标准实在太落伍,是中世纪经院学者如阿奎纳等人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训。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这个实践必须是长时间的实践,不能单凭短期的实践就宣称某种理论或对策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一种理论或政策的短期效应有时会与其长期效应不一致。例如,对于一种落后经济来说,计划经济的短期效果确实不错,但如果因此便认为主张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就是持久的真理,那就大谬了。同时要注意到,一种理论或对策的正确与否,往往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而言的。例如,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发展中经济或落后经济就未必是金科玉律。还要注意到,一种理论或对策的正确与否,往往还要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言。例如,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对于具有相对劣势的产业群体来说,就未必是好事。

在评价判断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正确与否时,必须看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一是从长期看,经济理论不能是智力游戏,不能推导和论证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经济理论终将被淘汰。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不论其纯学术色彩如何浓,归根结底要能够推导和论证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因此在长期中,公众和政府对于经济制度、政策的需求最终制约着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但在短期中,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其发展和演进主要受纯理论考虑的影响,许多时候是看不出它的发展与制定制度、政策有什么关系。二是经济理论与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着——对应关系。同样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也许可以从不同的经济理论推导而来,同样的经济理论也许可以推出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三是经济理论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制定经济制度、政策的唯一依据。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推论,为了符合逻辑

往往要依靠一些并不太符合现实的前提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制定在依据经济理论的同时还要依据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或经验。于是,一种经济政策的成败不能简单地作为一种判断依据,判断它所依据的经济理论的成败。

文本作者的分析技术或分析工具正确与否,应当从两个角度去进行分析。一个角度是技术或工具是否适应文本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另一个角度是技术或工具是否具有先进性。如果技术或工具不适应所研究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技术或工具使用得不正确,虽然技术或工具本身没有问题甚至可能还具有先进性。例如在研究小样本问题时采用计量方法。

所言要否,就是要分析文本所包含经济思想的重要性如何。重要性需要区分两个方面:一是它对于整个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性,或历史重要性,它是否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二是它对于当下的现实重要性。有些经济思想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例如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在历史上它推进了国际贸易理论,在当代它也依然具有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有些经济思想则只具有历史重要性而不具有现实重要性,例如斯密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只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这种区分为斯密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和节俭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观点已经不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 三、经济思想史的三种研究视角

经济思想如何发展演化,这既是一个科学考古学问题,又是一个科学心理学问题,也是一个科学社会学问题。

从科学考古学的视角出发,首先需要厘清基本史实:何时何地何人出版发表了何种论著何种观点,以后又在何时何地影响到何人。这就需要以编年史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各种经济思想观点的传承脉络,为各位经济学家和经济观点建立“家谱”。

作为科学考古学的经济思想史,可以大体分为通史和专题史两大类。

通史需要阐述古今中外整个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其代表作现有蒋自强先生领衔著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四卷本《经济思想通史》;还有专门阐述某个地区自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史,如外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其代表作有熊彼特三卷本的《经济分析史》,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赵靖、石世奇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

专题史有两种。一种是把整个经济思想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然后专注于某个经济学论域或论点、某个流派的发展历史,其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学说史》，张培刚、厉以宁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陶大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布留明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安道尔·马加什的《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晏智杰的《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杨德明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等。另一种则是把时间加以分段，专门研究某个时段（往往是一些重要时段）的经济思想，其代表作有布莱克等人的《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等。

从科学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主要是研究单个经济学家（往往是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思想脉络和心路历程，其成果往往是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个人生平传记和思想传记，如凯恩斯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等。当然，从这一视角出发，还应当研究那些重要经济学家是如何涌现出新观点的心理过程，即创新的心理过程，以便概括出经济学家创新活动的一般规则。这是一个亟待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就要探讨导致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社会因素、探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更加有利于经济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 四、科学社会学视角的一种分析模式——思想市场

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可以借助“思想市场”或思想产品的供求模式来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sup>①</sup>

与物质产品相比较，思想产品具有五方面特征：公共性、单件性（或斥重复性）、意义的模糊性、效用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

经济学思想市场上的需求方大体可以分为相对独立的三类主体：政府、公众和学术团体。三类主体的需求既相对独立，又有一定的交集。前两类主体的需求往往在决定经济思想发展的长期趋势上起着主要作用。三类主体的需求通常包含两个方面：（1）需要解释哪些经济现象，需要解决哪些经济问题，即需求指向。三类主体需求指向的并集就构成整个社会的课题集合。（2）用哪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经济现象，用哪种政策来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即需求落点。决定需求指向和需求落点的因素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分析需求的决定因素时，必须区分需求指向的决定因素与需求落点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思想市场上的供给方就是经济学家。供给所需的投入包括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和经济学家所掌握的知识资本。

---

<sup>①</sup> 参阅张旭昆：《思想市场论——分析知识产品演化的一个模式：以经济学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经济学思想产品与生产其他学科思想产品,以及从事科学活动与从事实际部门(政府、工商等)活动的相对收益(包括声誉、金钱和纯粹兴趣满足),是决定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决定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事经济科学的相对难易程度。

经济学家的知识资本可以区分为两大部分:经济学知识和非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首先包括以往对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说明,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以往分析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时所提出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分析方法,即熊彼特所谓的分析技术或分析工具。非经济学知识,包括经济学家的哲学观念,包括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包括各种基本能力,如发现问题尤其是发现重大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形成概念的能力、提出恰当假设的能力,以及为问题提供基本正确的答案或指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正确方向的洞察力,等等。

经济学家及其所掌握的知识资本决定了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它包括了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所可能生产的一切思想产品。它表明一定的经济学家和知识资本能够解释哪些经济现象、解决哪些经济问题,而无法解释哪些现象、解决哪些问题。但是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还要进一步受到思想市场性质的约束。那些受到世俗政府或宗教组织的意识形态控制的非自由的思想市场,能够被允许生产的思想产品的范围一般都要小于其生产可能性集合。这个受到约束的范围可以称作思想产品的可允许生产集合,它一般是思想产品生产可能性集合的真子集。只有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两者才会一致。

新思想产品总是出现在可允许生产集合与课题集合的交集之中。

可允许生产集合表明,在资源和思想市场性质的约束下,有哪些思想产品可能被生产出来。但这些思想产品中究竟有哪些被实际生产出来,则取决于经济学家们在追逐声誉、金钱和纯粹兴趣满足时的选题行为。

## 五、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经济思想自16世纪以来的发展,说明了供求模式在分析经济学说演化时的有效性。由于难以得到直接反映历史上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和需求落点的资料,只能从那些留传至今的经济学论著所解决的课题来间接推断当时当地公众和政府的需求。可以说,凡是适应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并成为需求落点的论著,往往受到公众和政府的关注。凡是没有迎合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的论著,往往发表后不会被公众和政府所注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也不会引起专业学术团体的关注,也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关注。

## (一)富国裕民:16世纪至19世纪初经济学的主题

### 1. 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英法两国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主要是如何富国裕民,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在理论上,他们要求说明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在政策上,他们要求能增加国民财富的政策。围绕富国裕民这一主课题,形成若干派生子课题,如怎样增加王室和政府收入的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对外贸易问题等。

公众和政府的这种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与那三个世纪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密切关联。从经济上看,那时英法两国都还未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在这种国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很容易(但远不是肯定)形成追求富国裕民的价值观念。从政治上看,英法两国都已摆脱中世纪封建状态,建立了统一民族国家。追求国家的富强以及王室或政府财政收入的充足,成为统治者关注的首选问题。

### 2. 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

与这一阶段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相对应,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其实是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英法两国的重商主义(包括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英国从配第到斯密的早期古典主义,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到重农主义再到西斯蒙第(指发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以前)、萨伊和巴斯夏,他们要解决的课题都是如何富国裕民,发展本国经济。区别在于对财富性质的不同看法,对致富原因的不同看法,如何致富的不同方法。只有紧紧抓住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这一主线,才能全面准确理解他们的论著,把握其历史意义。

在这一阶段,价值论分配论并非经济学家考虑的主要问题,只是他们在考虑发展问题、富国裕民问题时的副产品。把价值论分配论当作这一阶段经济学家尤其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论题,其实是19世纪经济学家的理解和解释。而这种理解和解释受到19世纪公众和政府需求指向的强烈影响。在这种需求指向影响下,19世纪经济学家更注重更强调第一阶段的经济学论著中的价值论分配论内容,以至于直到今天,大多数经济学说史论著仍然是以价值论分配论为主线来叙述从16世纪开始的经济思想发展,而严重忽略这些早期经济思想中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这一主线。

若要尽量避免对前人论著的主要内容的理解偏差,可以采用内容定量分析法来分析前人论著的主要内容,即根据不同内容在论著中所占篇幅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对于书来说,可按页数计算)来确定一部论著的主要内容。该方法假设作者总是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上花费最多笔墨。当然这一前提未必完全无误,但在没有更好的定量方法来判定作品的主要内容时,显然是一种可行方法。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每位经济学家的论著都严格采用内容定量分析法来判定其主要内容。但任何一位阅览过英法两国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的主要经济学论著的人,只要他不再过分偏重价值论分配论,则总会发现发展论是这一阶段经济学的主题。以威廉·配第为例,遍读他的五部主要经济学论著——《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货币略论》——就可看出,他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革税制、如何发展英国经济、如何改变殖民地落后面貌、如何正确看待货币。而价值论分配论只是他考虑上述问题时的副产品。再比如说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他们论著中可以算作价值论分配论的内容比重很小,而可算作发展论的内容则触目皆是。

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其经济学论著的名称便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见他关心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关心构成他看不见手的理论及经济自由政策主张的基础。他看不见手的理论所关注的并非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而是促进增长的条件。

《国富论》按中文版计算,上下两册共893页,各种内容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列表如下:

内容主题	页数	比重(%)	备注
价值论分配论	180	20	上册第26~169页,第208~229页,第235~251页。
经济发展理论	398	45	上册第5~19页,第253~382页,下册第1~253页。
财政理论	258	29	
其他	57	6	

由此可见,发展论或富国裕民论在斯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价值论分配论只占次要地位。价值论与整个《国富论》的规模与意义相比,似乎只是一个相对小的分析点。

从斯密写作《国富论》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他更重视发展论而非价值论分配论。一般认为,《国富论》的前身是《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演讲》中价值论分配论都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这可从价值论分配论在《演讲》中的排序(第二篇第二部分第七节)及所占篇幅看出来。由《演讲》内容来看,斯密分配学说最初并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的主要内容,尽管第一篇标题提到分配问题。显然斯密未去法国以前,早已写好分工、货币、价值和职业工资差异的原因等内容,但分配计划是个空白。后来他从重农学派处得到

必须补充一个分配研究的意见,因此他把自己所想的内容附在已写好的价值学说之内。而且斯密的价值理论完全是他的发展论或富国裕民论的附论。在《演讲》中,这一点特别明显,斯密认为使商品市场价格永远停留于自然价格之上,会减少国家的财富。使市场价格跌到自然价格之下的措施也有相同影响。由此可知,斯密是把市价对自然价格的背离看作减少国民财富的原因。因此他就要探讨自然价格的决定因素和衡量尺度,以及市价对自然价格产生背离的原因,这种探讨就构成了他的价值论。

至于斯密体系在欧洲大陆的最初传播者萨伊,也可用内容定量分析法分析其初版于1803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全书按中文版计算为534页。分析结果列表如下:

内容主题	页 数	比重(%)	备 注
财富的生产	260	49	第一篇
财富的分配	118	22	第二篇
财富的消费	114	21	第三篇
其 他	42	8	绪 论

从上表可以看出,被后人概括为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理论在萨伊这本书中所占据的地位。应该说,萨伊首先关注的是财富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其次才是财富的分配和消费。

### 3. 斯密革命:经济理论长期逐步演化的结果——从供给角度的说明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内,英法两国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始终围绕富国裕民问题发表论著,这只能从公众和政府的需求指向中得到解释。在这段时间里,围绕如何富国裕民这一问题,经济学由重商主义发展到古典主义。这是经济学演化中的第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以斯密的《国富论》为主要标志。这场革命是经济理论长期逐步演化的结果,是应当从供给角度去加以解释的。若把这场革命成功的标志定为两条:(1)斯密的政策主张为公众和政府所普遍接受。(2)理论体系在专业学术团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则成功原因要从公众、政府和专业学术团体需求落点的变化上去说明,从造成需求落点变化的因素上去说明。

斯密革命的要点是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论点。(1)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由生产性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2)导致国民财富增长的首要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及他们之间的分工,而这两者都有赖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有赖于节俭。(3)导致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在市场上按其自

价格出售,或者说商品市价能够自动趋向其自然价格。这就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干预总会使市场价格长期偏离自然价格;而减少干预就要在外贸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在国内消除妨碍资本和生产性劳动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让市场调节进出口贸易和资本与劳动的流动。(4)为了说明自然价格的决定和衡量,他提出了价值论和分配论。(5)为了论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他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

斯密的上述论点对于重商主义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但它并非一场格式塔转换,它是斯密在继承前人所创立的知识资本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结果。斯密关于财富性质的看法,在他之前的一些英国经济学家那儿已经出现。在法国,由于约翰·劳计划的破产,斯密的观点也已被重农主义者所特别强调,甚至在布阿吉尔贝尔那儿就早已被提出。对于分工的意义,配第早已谈到,斯密的新意见主要是分析了分工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这属于对原有理论的深化。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是重农主义者提出的一对概念,斯密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解释,改变了它们的内涵。斯密的资本理论恐怕与重农主义者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在《演讲》中,几乎没有生产性劳动及资本方面的内容,而在《国富论》中,它们却占据了重要地位。关于节俭的意义,休谟已经充分肯定。只是没有把节俭与资本积累明确联系起来并加以强调;而斯密则补上了这一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是法国人最早提出并产生影响的(虽然严格地讲,英国商人诺思更早提出这一主张,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它被重新发现是在法国人自由放任的主张早已传遍英法两国之后)。但对这一主张何以能增进财富的原因所进行的分析,当属英国经济学家。在休谟之前,英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和范德林特就已经看到一国所拥有的货币数量对该国物价水平的影响,但他们基本上还仍然坚持重商主义的外贸顺差观。休谟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建立了进出口贸易自动平衡理论。由此证明在自由放任条件下,重商主义的顺差论是一个无法长期实现的目标,同时也证明一国的货币不会长期被输出,而是会自动趋向某一与该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水平,因此政府干预完全没有必要。可以说康替龙和范德林特提出了最终将置重商主义于死地的理论——货币数量论,但仍然坚持重商主义的政策目标——外贸顺差。而休谟则运用货币数量论,指出了重商主义政策目标的不可实现性,以及其政策手段——政府干预——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斯密则进一步将休谟对货币所作的上述分析,推广到所有商品上。斯密是与休谟有交往的,他不可能不从休谟那儿受到启示。用今天控制论的术语来讲,休谟提出了一国货币的供求在其价格的作用下自发趋向均衡的负反馈机制,而斯密则指出这一负反馈机制存在于一切商品中。因此,不仅在外贸方面,



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在一切商品中,政府干预同样不必要。自由放任条件下一切商品自发趋向供求平衡,市场价格自发趋向自然价格,而这又将是更有利于财富生产的状态。

综上所述,斯密革命是经济思想逐步演化的结果。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少经济学家或者在基本理论上,或者在政策主张上,或者在这一问题上,或者在那一问题上,陆续提出了一些否定重商主义的命题。斯密的作用便是把这些分散的命题连接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斯密并不是简单地把前人的东西拿来堆在一起。由此可知,斯密革命并非一种顿悟,一种格式塔转换。它只是长期演变过程中的最后一环。

#### 4. 斯密革命:需求落点的转移

经济理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本,有助于说明斯密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但还不能说明斯密革命何以成功。有两个例子说明单凭理论本身的特征并不能保证它取得成功。一个例子是英国商人达德利·诺思在1691年匿名发表《贸易论》,第一部鼓吹自由贸易的小册子。李嘉图在1822年对它评价甚高。但它竟被埋没一个多世纪,何以如此?生不逢时。17世纪末,英国国力尚不强大,仍需借助政府干预来发展经济,一本鼓吹自由放任的小册子自然不可能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尽管它迎合了他们富国裕民的需求指向。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于1841年发表反对斯密自由贸易主张的论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随之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难道自由贸易主张不正确?非也。原因在于当时的德国,斯密的主张无助于经济发展,故不能成为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当时的需求落点只能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

斯密革命的成功,首先在于1776年以后的英国已不再像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那样仅仅是二流国家。它已经开始成为超过荷兰和法国的一流强国,18世纪最后20年中出现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终于成为整个19世纪的一流强国。在这样一种国势之下,自由放任无疑是比政府干预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因此公众和政府的需求落点便逐步由重商主义的干预政策转变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放任政策,为自由放任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斯密体系便为公众和政府所普遍接受。

斯密革命成功的又一因素是把以往零散出现的经济思想综合成一个理论体系。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国富论》一书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协调整理这一工作。在他之前,英国的经济学论著大多是商人、哲学家们所写,不成体系。斯密是第一个以学者身份建立经济学体系的人。这使他比其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人更容易为专业学术团体所接受。当然,单凭一个体系并不能被专业学术团体所接受。重商主义者詹姆士·斯图亚特曾于1767年